

上海鲁迅研究 4

SHANGHAI LUXUN YANJIU

J210.97
S223
4

4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LUXUN
YANJIU

上海
鲁迅
研究

1987.10

本书顾问 丁景唐 王元化 方行 许杰
(姓氏笔画序) 杜宣 陈沂 陈鸣树 罗竹凤
赵家璧 夏征农 倪墨炎
编委 王锡荣 朱嘉栋 吴长华 周国伟
(姓氏笔画序) 顾八纘 唐应光 凌月麟 虞积华
责任编辑 王锡荣

封面设计：陆全根

上海鲁迅研究（四）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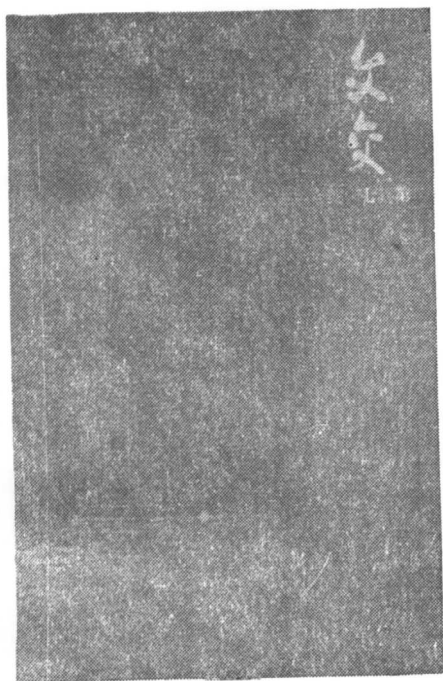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出版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2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10,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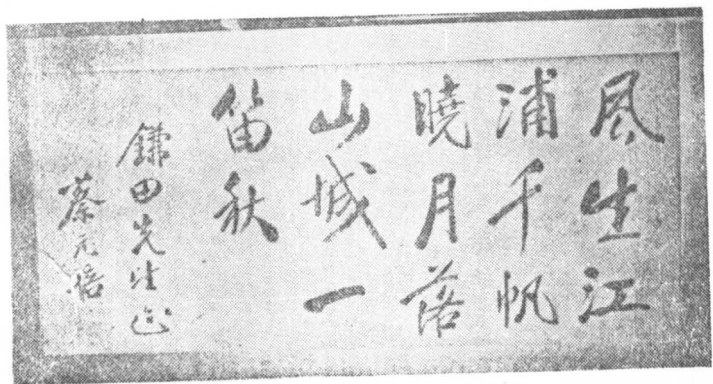
印数 1—3,000

ISBN 7-80576-167-1/I·66 定价 2.90元



← 鲁迅为《文交》
所题写的刊名。

↓ 蔡元培为镰田诚一
写的条幅。



目 录

· 纪念“左联”成立六十周年 ·

- “左联”回忆残稿 陈企霞 (1)
- 优秀党员、优秀作家——忆周文 王尧山 (4)
- 周文之死 郑育之 (11)
- 韩起简史 董曼尼 (18)
- 重现人民心中的“左联”丰碑
——纪念“左联”成立六十周年 杜 埃 (22)
- 记诗人杜谈 申 春 (26)

· 馆 藏 一 斑 ·

- 《神盖记》稿……[匈]米克沙特 原作 周作人译 鲁迅校改 (29)
- 关于《神盖记》译稿 华 融 (58)

· 鲁迅与同时代人 ·

- 关于鲁迅与陈梦韶的几件史料 陈元胜 (64)
- 《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考订二则 陈冠英 (70)
- 朱吉人与朱安及鲁迅 杨志华 (76)
- 鲁迅与内山书店职员
——鲁迅与日本友人交往和文化交流之一 周国伟 (80)
- 三十年前翰墨缘
——介绍陈烟桥谈《鲁迅与木刻》的一封遗札 陈梦熊 (92)

· 考 证 一 束 ·

- 关于《国际劳动问题》的内容、译者及小引 韦 工 (95)

关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史料及辨析	沈 濯(106)
鲁迅有关人物新考二则	贾玉民(117)
《小说史大略》的定稿时间及其他	丁言模(124)
《怀旧》的五次刊载	彭耀春(129)
《世界文化》第二期的发现及其他	朱嘉栋(131)

· 新 论 ·

鲁迅知识构成的历史与特点	王锡荣(134)
论鲁迅与易卜生	曹树钧(154)
鲁迅与赫胥黎的道德起源论、善恶论	刘福勤(166)
鲁迅论《楚辞》	殷光熹(179)
阿Q和阿金——病态人格的两面镜子	黄乐琴(187)

· 海 外 论 坛 ·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寄语	
——读后感二三	[日] 丸山昇 著 潘世圣译(196)
《上海鲁迅研究》小感	[日] 北冈正子作 金 茹译(204)
北冈正子教授的来信	金 茹译(206)

· 争 鸣 园 地 ·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	吴作桥(207)
一种早该停止的流行说法	陈根生(216)
鲁迅早年诗作新估	洪 桥(221)
谈鲁迅作品中绍兴方言的注释	祝肖因(232)

· 书 评 书 讯 ·

刻意求真遍寻实——《鲁迅年谱稿》简评	强英良(236)
喜获东瀛书一编	王尔龄(238)

• 陈 列 研 讨 •

- 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列艺术探讨……长华 虞积华 顾八紘(242)
国内第一个鲁迅展览会 ……凌月麟(248)
编后记 ……编 者(251)

补 白

- “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乌市举行 ……一 士(28)
江苏鲁迅研究学会举行年会 ……金 易(79)
杜一明向上海鲁迅纪念馆捐赠艺术品 ……令(94)
日本举办“增田涉与鲁迅”展 ……凌(116)
“于无声处”新解 ……康 荐(195)
征文启事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215)
鲁迅为《中华木刻集》题签又一证 ……康 文(220)
上海将重印鲁迅著作小说、散文集……人 韦(247)
日本内山之会访华团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 ……朱惠兴(250)

“左联”回忆残稿^①

陈 企 霞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50 年了。

在我的思想与生活必然发展的途径上，在极短促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曾参加过这个联盟，这联盟的伟大旗手是鲁迅先生。一度作为一个小兵，我总是觉得自己在这一点也能无愧地引以为荣。我能在这条艰苦而紧张的战线上真正只是普通一卒，而且只是一个“作战不力”的普通一卒，对照众多战友们的赫赫战果，50 年后再来回顾，却总是惭愧万分。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些年代，国内局势的动荡、民族存亡、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卖国的法西斯蒋介石政权，继续他“四·一二”事变以来的企图剿灭共产党的各种暴行，真可谓杀人如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那样的年代里，在政治上坚决对抗反动统治，尤其在文化上，在冲破所谓“文化围剿”，建立阵地，培养战士等方面，我以为这成就是不可抹杀的；对于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学的革命传统，开展以后热火朝天的抗日文学，在作品的数量质量上，作家的阵营和战斗力上，它的规模都是空前的。

我第一次明确地比较完整地知道中国有个左翼作家联盟，是读了鲁迅先生发表在大型文艺化的《现代》杂志上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以后。这篇文章对于我个人政治上、思想上，以至情感和人生观上的启发和影响，是很大的。一直到现在，50 年过去了，我还有着当年读这篇文章的内心的激动。当时被杀害的左翼作家柔石，我小时在家乡就读过他的小说《疯人》，署名赵平复，好像是自费出版的。

^① 这是作者 1980 年所撰写的未完稿。

另外，当时有位老作家彭家煌，化名“蕴松”，他可能刚从上海监狱出来，到宁波来避难。他在宁波是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这个副刊十分有意思，提出了“文学大众化”的口号。对于《民国日报》这样的报纸，过去我是从来不看，因为它明显的是国民党的党报。可后来我在它的副刊上慢慢发现了有不同的味道，就注意了起来，并投过一些稿。当时彭常常用“蕴松”的化名在副刊上用启事的方法和读者联系，我投了几次稿后，彭要我到编辑部去见他，我们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当时我只有18岁），他是我文学上第一个老师，他和我谈了一些“左联”的情况，当时彭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我记得他和我谈的主要内容，是创造社和鲁迅的论争。

1932年我在偶然的关系到，和当时在上海的叶紫通信。在写作上，叶紫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是很大的。他大约比我大一二岁，我们信件来往是充满热情的，互相称兄道弟的。我写的一些小东西，他常常帮我介绍给上海、杭州一带的报刊。当时我是练习写作，很看不起自己写的东西，所以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换一个笔名。

这年年底前后，叶紫写信提出，要我到上海去，同他一起参加文学活动，我们俩又穷又没有地位，居然想办一个大型文艺刊物，即《无名文艺》月刊，真可以说是惨淡经营，焦头烂额，只出过一期。这期上发表了叶紫的成名作品《丰收》，从此他开始了小说家的生活。就在这刊物上，彭家煌也发表一篇小说《垃圾》，署名“岛西”。从此我便渐渐地认识了聂绀弩、吴奚如等人。不久，叶紫告诉我说，我们应该参加左联。我开始完全不知他和谁接洽的，我现在记得，第一次正式以“左联”名义来看我们的是胡楣（即关露），最后来通知批准我们加入左联的是谭林通，此人我不知其下落。

我们参加左联的活动，是以分小组的方式，在法租界，不是在这个亭子间，就是在那个亭子间。我们这个小组，除了我和叶紫之外，我记得还有：聂绀弩、吴奚如，还有几个女的。小组会上，我记得一般没有什么中心的讨论题，大部分时间讨论自己的和人家的

作品，也谈论一些当时文艺运动上出现的现象和问题。这段时间我参加“左联”的活动大约只有三四个月。我还记得有一两次胡风在这个小组上出现过，我应当老老实实地说，那时我对胡风印象极好（这里应该说一句废话，从长期的情况来看，现在不至于再有人给我加一顶“胡风分子”的帽子吧！）。

有几件事，我觉得在这里提一下，是不会没有意义的。

第一，当时我们这些文学青年们对冯雪峰是非常敬仰的，虽没见过面，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风格，修养和为人，都很受我们的敬仰。我记得有个朋友曾半开玩笑地说：冯雪峰是第一个带着原稿子到苏区去的作家。当时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听了非常羡慕和神往。

第二，〈自由谈〉开始由黎烈文作编辑后，鲁迅先生所写的杂文，最早用“何家干”的笔名发表。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在早上读〈申报〉时，常在笔名上研究哪篇是鲁迅先生写的，并且打电话相互通知，奔走相告。这种景况，几乎很难形容。解放后我看过苏联一部别林斯基的传记片，里面有描写别林斯基的文章发表后，在莫斯科各大学里轰动的情况。这使我很快联想到鲁迅先生的这些文章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立刻发生反响的情况，无论从范围还是影响来说，我认为都是远远超过前者的。

优秀党员、优秀作家

——忆周文

王 尧 山

今年，是周文同志逝世 37 周年。长期以来，我总是怀念着这位老战友，可是没有机会，现在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把我对他的悼念写出来，这与当前精神文明的建设还是有益的。

在三十年代，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文化上反“围剿”斗争尖锐。在这段日子里，上海有位左翼文化战士，笔名叫“何谷天”，他就是优秀的党员作家周文同志。

我是在 1933 年一个偶然的认识周文的。人说“嘴巴可以说谎，眼睛不会骗人”，这话不假，我和周文交往，就是见面就被他的真挚情感和信任目光所吸引的，后来逐步建立起了革命的友谊。1933 年我 20 岁出头，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化名路丁做地下工作。因我爱好文学，经周文介绍，参加了“左联”办的青年文学研究会，从而结识了周文和他的夫人郑育之。一次，青年文学研究会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附近一家咖啡馆开展文学创作活动，听一个名叫许啸天的作家讲演。这个许啸天在会上神气活现，信口开河，说什么“写乞丐就应去讨饭，写痛苦就要自己痛打自己”，他认为这样做就叫做现实主义的创作。大家听了好笑，但没人敢驳斥他。我当时血气方刚，当即向他开炮，我以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药》、《孔乙己》等名篇为例向他提问，弄得他张口结舌，非常难堪。我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掌握青年文学研究会工作的周文的注

意，他主动接近我，和我交朋友。

周文中等个头，四川口音，说话不多，但很诚恳。他那时25岁，清瘦的面孔，突出的颧骨，凹陷的两颊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面容相当憔悴，一眼就能看出，他虽年轻，但已饱经沧桑了。他是“左联”的党员作家，经常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指导，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已很有名气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患有肺结核病，健康状况不佳。他是“青山原不老，为雪白了头”的，他为了党的事业，心无怨气，口无怨言，默默无闻地勤恳工作，经受着贫困和病痛，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工作，从早到晚，里里外外，总是一刻不停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的形象和为人，深深教育着我。

他知道我有一段学徒生活经历，并参加过工人罢工斗争，就亲自和我促膝谈心，向我了解学徒的痛苦和工厂罢工斗争的情况，鼓励我把它写成文学作品。我的小说写成后，他又指导我修改，并把它推荐到“左联”创办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接着，他又介绍我参加了“左联”，正式加入作家行列。为了使我能成为一名革命的作家，周文反反复复地帮助我端正创作态度，强调说“不能为创作而创作，我们不是资产阶级作家，不是小资产阶级作家，而是无产阶级的作家”。他说，“左联”的作家就是革命的战士，笔就是武器，写作就是战斗。他党性很强，作风朴实，办事认真，对我的帮助既耐心细致，又旗帜鲜明。

1934年，我接替他的工作，担任“左联”组织部长，在移交工作时，他一件一件交待得非常具体而清楚。为了使熟悉“左联”的党员情况，他带了我一个区一个区地跑，介绍我认识和熟悉每一个党员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同时还一一介绍了“左联”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和所办刊物的情况。移交时，他情况之熟悉，头绪之有条理，使我十分惊奇。1936年，我又接替他担任与党中央联系的政治交通员，为了使熟悉交通线上的情况，他亲自带我跑了一趟上海至西安的秘密交通线，介绍了每一个接头地点和暗号。由于他的细致安排和帮助，派到上海工作的中央代表冯雪峰与党中央的联

系一直畅通而安全。

在白色恐怖下，“左联”组织和党员骨干所以未受损失，“左联”所以能坚持下来，党的秘密交通线所以没有出问题，这些与周文同志出色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每当我回忆起周文时，我总是要联想起我们家乡的一眼老井。这井地理位置低下，所占面积甚小，但却四季不枯，长年默默无闻地供给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这多么象周文同志那“胸怀千里志，不居一寸功”的为人和品德啊！

周文原名何开荣，字稻玉，1907年出生于四川荣经县。1932年经叶以群、丁玲介绍，参加“左联”，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7月1日，不幸逝世，终年45岁。他的一生虽短如闪电，但光照人间。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他用何谷天、司马庇、老根、稻玉等笔名，在贫病交加、白色恐怖的艰难条件下，创作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童话和评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周文的经历是曲折而坎坷的，他父亲何天枢是个开中药铺的中医，但他在周文6岁时便丢下妻儿谢世了。母亲张蕴略有文化，能绣善画，对周文的教养自幼甚严，她以封建的旧观念要求周文用功读书，作两个弟弟的表率，将来光宗耀祖，使周文自幼养成勤奋读书，手不释卷的习惯。15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公学，但因家境贫寒，供不起学费被迫中途退学。为了生活，他刚满18岁便出外谋生，亲眼目睹了军阀队伍腐朽、丑恶的行为和劳苦大众受迫害、受侮辱的情景，增强了他同情无产者的感情，加深了对旧社会的憎恨。1927年，他在图书馆发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书籍，从此他与新文学结为“朋友”，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从中悟出了“人生”问题，找到了借书发泄愤恨和怨气的工具，萌发了文学创作的欲望，开始撰写小说。后来，由于他在康定的学生和青年中组织研究新文学、编演文明戏等活动，遭到了当局的迫害，把他当作“赤匪”缉查和追捕。在康定站不住脚，便冒着纷飞的大雪，沿着大渡河踏上了川康公路，越过禁门关，千里迢迢流落到了成都、南京、杭

州等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他已认定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带病挣扎着不停地写作。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连发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周文毫不犹豫，带着笔投入到抗日爱国斗争的行列，来到安庆市一家安徽省教育厅办的《中学生》杂志作抄写工作。此时，左翼作家叶以群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抗日战争，他受党的委托，从上海来到了安庆，以《安徽教育》主编的身份为掩护，在安徽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到处发展组织，联络同志。在一次活动中，他发现了才华横溢的周文，觉得他言行举动与众不同，便了解他的身世，主动与他交朋友，把他调到《安徽教育》编辑部当他的助手，并吸收他参加了秘密读书会。不久，文化总同盟成立安徽分盟，周文被选为分盟的组织部长，从此他走上了文化战线的斗争行列。

1932年夏，叶以群回上海，把安徽文化分盟的工作交给了周文和刘丹。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在安徽进行大逮捕，“文总”安徽分盟遭到破坏，周文从安庆逃到了上海，参加了“左联”。1933年，周文经丁玲、叶以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国民党反动派除对我苏区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外，也对左翼文化阵营发动了文化“围剿”。左翼文化战士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巩固和壮大了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

1933年1月，周文调任“左联”组织干事，3月当选为常委。他除负责油印、发行外，并兼任对复旦、暨南、光华等大学文学小组的联系。当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只强调作家写工农，不写其它，曾一度束缚了周文的创作路子，但后来，在创作实践中曾有突破。周文的创作非常认真，构思时总是斜靠在床上默默无言，手上拿根火柴杆或一张纸条不断地搓卷。这时他的作品即将构思成功了。他自称这是“十月怀胎”。当他伏案撰写时，他总是茶饭不思，困倦不睡，连续战斗，一气呵成。党号召作家要以革命精神写作，要求作家在反文化“围剿”斗争中写得多、写得好、发表快，突破反动

派的文化“围剿”。周文积极响应号召，把自己关在亭子间里，迎着烧饭炉子的煤烟和炭灰，忘我地、拼命地写。作品一篇接一篇地发表了，但他的病也一天天加重，人更瘦了。然而，斗争是复杂的，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欲图打击他，讽刺他为“多产作家”。周文对此嗤之以鼻，多产作家有何不好呢？他不在乎。当他出版第一本集子时，有意定名为《多产集》，以回答嫉妒者。

1933年4月，周文兼任“左联”的发行工作，由丁玲直接领导。为了避免遭国民党反动派袭击和破坏，他经常在严密遮光的房间里工作，通宵达旦刻印宣传品，次日一早还得把宣传材料送到“左联”各小组和文委，分发到“八大联”去。1933年5月，丁玲和潘梓年被捕，发行工作改由文委的华蒂（即叶以群）领导，周文的工作更加隐蔽、繁忙和危险了，但他无私无畏，坚持工作，同时还挤时间写作，不停地发表作品。1933年9月，周文参加由宋庆龄主持、冯雪峰筹办的“远东反帝反法西斯战争会议”的工作，会议的宣传标语、传单口号，都是周文一手草拟的。10月，周文与刘丹合编《文艺》杂志，大量刊登左翼青年作家的作品，虽只出版了三期即被查封，但得到了鲁迅的赞扬和支持。鲁迅不仅为《文艺》提供青年作者的大量稿件，还将该杂志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说“这本杂志完全是左翼青年作家的园地”，并从中选出周文写的小说《雪地》推荐给伊罗生，编入《草鞋脚》。同时，又把周文的另一篇小说《父子之间》介绍到日本，发表在1936年9月的《改造》杂志上。

1934年1月，周文任“左联”组织部长，5月当选为“左联”常委和党团成员，工作更加繁重。当时“左联”的成员大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个个奋发有为，生活俭朴，刻苦用功。周文和大家一样生活非常艰苦，住的是朝北的亭子间，冬天象冰窟，夏天如蒸笼，但他仍不停地写作。为了节省一顿饭，他夜里写，白天睡，渴了到老虎灶抱壶水，饿了花12个铜板买碗阳春面。有时稿子发不出，经济困难，只好寅吃卯粮，借债度日，房租交不出，就向房东太太讲好话。尽管如此，他从未停过笔，从未中止过战斗，他用各种笔名同反动

派周旋，写出了《薛仁贵征东》、《弟弟》等中短篇小说和尖锐的杂文。同时，他还参加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建立大众化的文学运动。这时，由于工作和写作太紧张，又导致了他肺结核病的复发。生病期间，他仍坚持工作和写作，不肯休息。

1934年11月，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捕人的警车日夜嘶叫。一天，周文在法租界被捕，遭到毒打。幸好，巡捕房把他当作偷盗抓的，⁵因为他穿的衣服太陈旧。后来他的夫人郑育之通过组织把他保释出来。1934年12月，他第二次被捕，他是送一份宣传材料到一个同志家，被埋伏的暗探逮捕，由于他聪明机智，立即把稿子毁了，后经花钱活动，只作为误捕被释放了。1935年，上海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周文由于隐蔽较好，千方百计掩护“左联”组织，所以“左联”未受到大的破坏。

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他通过鲁迅联系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便是周文，周文被留在冯雪峰身边工作，担任冯雪峰与党中央联系的政治交通员。

1937年，中央军委王稼祥经上海赴苏联治病，冯雪峰派周文接待和掩护。在候船期间，周文为了王稼祥的安全终日闭门不出，并且利用闭门不出的时机抓紧写作，完成了中篇小说《在白森镇》和长篇小说《烟苗季》的创作。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地下党为了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派出大批党员骨干到全国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周文被派往他的四川老家。周文到四川后，在成都兼任了四个报纸的副刊主编。他主编副刊的目的是培养新人，当他发现新人后立即把工作交给他，又去开辟新的园地。如1937年12月，他在《新民报》编《国防文艺》，1938年3月又到《四川日报》编《谈锋》，三个月后又去《新新新闻》编《每日增刊》，最后到《捷报》编《文岗》。他的做法目的是繁荣文艺，培养青年，加强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加强文艺战线的抗日斗争。同时，自己仍积极写作，不断为武汉的《七月》，重庆的《群众周刊》、《文艺阵地》供稿。在工作中，他既坚